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主办 第 6 期（总第 414 期） 2024 年 6 月 5 日

- ◆ 中食药发展大会暨《通讯》30 周年座谈会在农业农村部召开……大会组委会（1）
- ◆ 农民入城还是回村决定着现代化方向……刘守英（4）
- ◆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破解农民增收难……魏后凯（6）
- ◆ 重视研究改革开放的地缘差异……赵树凯（8）
- ◆ 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有偿使用费，何错之有……吕德文（11）
- ◆ 乡村消费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动能……全世文 乔 慧（13）
- ◆ 土地产权国有导致 50 年环境破坏甚于过去 5000 年……陈志武（16）
- ◆ 健全农民自建房长效管理机制……瞿理铜（19）
- ◆ 《农业与工业化》——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创新……张蓝水（22）
- ◆ “中国产能过剩论”：又一张“保护主义”牌……社科院课题组（26）

中国食品(农产品)药品高质量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 暨《三农工作通讯》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 在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隆重召开

大会组委会

5月23日,中国食品(农产品)药品高质量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暨《三农工作通讯》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在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隆重召开。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尹成杰,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原司长张天佐,中国食药促进会三农工作委员会顾问、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郭书田,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会长毛振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原局长杨红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刁力军,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服务业统计司)专职党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张芑,《中国食品安全报》社社长朱长学,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报》党委书记徐志军,生态环境部核安全监管司副司长、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 ESG 分会会长叶荷瑞,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饲料研究所原所长戴小枫,农民日报社种植业部部长杨久栋,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中草药研究中心主任郭玉海,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新望,中国食药促进会三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胡兆荣以及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四川、河南、山东、海南、福建等相关涉农企业和研究机构负责人,新华社、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商报、中国农业网络电视、中国网、中国日报网、中国农业新闻网、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媒体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中国食药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新望主持。

会上,中国食药促进会毛振宾会长向胡兆荣主任颁发了任命书,任命胡兆荣同志为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三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兆荣主任在致辞中讲到,三农委员会的工作目标,旨在降低人民健康风险,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真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我们的目标是“让厨房替代药房”、“让食品替代药品”,我们的目的是让14亿中国人少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补短板、强弱项,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14亿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三农事业健康发展做贡献。

毛振宾会长在会上作了“推动食品(农产品)药品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深化安全治理”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推动食品(农产品)药品高质量发展,深化安全治理是关键。一是要深化食品药品安全人本治理;二是要深化食品药品安全风险治理;三是深化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他特别强调要深化食品

药品监管科学的运用。食品药品监管科学，是以食品药品监管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提升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质量与效率为目标，以监管工具、标准和方法创新为重点的一门新科学。

尹成杰副部长在致辞中表示，在新形势下，面对新要求新任务，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集中力量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把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转变为企业发展的自主行动。落实到企业发展的实践当中去，从源头加强控制，抓好农产品的安全生产。

张天佐总师在讲话中谈到，推进食品（农产品）药品高质量发展，要抓住五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要在产出来和管出来上进一步下功夫。第二个要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相关的质量标准，做到有标可依和我们相应的技术规范，质量安全卫生的标准，生产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和标准都要进行提升。第三个要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体系，让我们的食品和农产品能够全程可追溯。第四个就是要进一步的净化市场，防止劣质驱逐良质，让好的产品能够卖出好的价格，让我们的产品有更好的品牌效应。第五个要科学监管，推进食品（农产品）科学有效有序的高质量健康发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原局长杨红灿在讲话中谈到，食品（农产品）药品是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食品（农产品）药品的质量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这次大会的召开，正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食品农产品和药品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食品药品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刁力军、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服务业统计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张芑、《中国食品安全报》社社长朱长学、生态环境部核安全监管司副司长叶荷瑞、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戴小枫、中国农业大学中草药研究中心主任郭玉海、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党委书记、二级巡视员尚建刚、《经济日报》产经新闻部副主任顾阳等领导、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代表在会上都做了精彩的发言。

会议期间，三农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专门介绍了《三农工作通讯》的发展历程。介绍中谈到，1991-1994年每年出版一本专辑《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王任重副总理题写了书名，国务委员陈俊生、老部长林乎加与刘中一部长题了字，老部长何康作了序《志在兴农意犹酣》。四本书共165万字。此事为中央国家机关首创，受到中央组织部的表扬。之后由《通讯》更名为《三农工作通讯》，而且一直由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报送中央多部委和各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此举受到了中国科学院原党委书记田夫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支持，又受到国务院原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关切，并题写了“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珍贵墨宝。该刊物历经了三个阶段共35年，累计共刊出4000多篇文章，约1700万字，受到农业部内外老领导、老专家的欢迎与好评。在老作者队伍中，不少已经去世，他们留下的笔迹，会发挥永不消失的作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崇高的敬意，对所有支持和参与以及资助这项具有历史意义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期间，毛振宾院士和胡兆荣主任分别给十家理事单位颁发了证书并进行了集体合影。胡兆荣主任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到，本次大会得到了北京中垦道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德懋农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成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单位全体同仁对他们慷慨奉献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由衷的感谢，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单位将义无反顾、责无旁贷的全方位支持各类企业的发

展，为食品（农产品）药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北京中垦道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金蛟在发言中讲到，2024年，中垦中药进行了“中药材GAP种植管理数智化平台”软件研发，已列入中农发集团重大科研项目。该平台在种植户注册时，可通过卫星定位标出其种植地块，线上有科研院所专家、地方有实践经验的乡土专家和本公司技术团队共同研究的标准化GAP种植方案，种植户可遵从方案步骤种植，并用手机录像、照相、文字等方式记录下来，最后一键生成二维码，完成中药材种植全程可追溯。

江苏成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舟在发言中说，公司自2016年成立以来，秉承乡村振兴宗旨，围绕生态开发，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以碧根果产业为特色，致力于构建一个集绿色林果生产、高端木本食用油制造、农业创业和科技创新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综合体。目前已建成国内连片面积最大的碧根果种植基地，种植碧根果树1万亩，约12万株，总投资近3亿元。公司围绕深耕拓展优质碧根果产业链，致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绿色有机康养品牌。

四川德懋农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罗鸣讲到，四川德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7月，注册资金5亿元人民币，是一家以农业产业为主，集农业开发、水利水电建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品牌运营管理、互联网销售为一体的县属国有企业。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就一定能够开创农业企业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在一片喜气祥和、催人振奋的氛围中结束，参会人员都期待着每年一届的“中国食品（农产品）药品高质量发展大会”早日召开，届时将共享更多的科技成果盛宴。

（作者：中国食药促进会三农工作委员会大会组委会。2024年5月23日）

农民入城还是回村决定着现代化方向

刘守英

历经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城乡关系在 2003-2010 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迁，告别了那个以农为本、以地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阶段。

这一变革的根源在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而推动这一变革的主力军，正是农二代——这批继承了上一代离土、出村传统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的道路。这一选择导致了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离土出村成为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最主要力量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迁移的“农一代”，在经历了多年的城市漂泊和艰苦打拼后，往往选择“返乡”和“回村”。“农一代”很少有长期留在城市的期望，他们通常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相对艰苦的居住条件等，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积累更多的资金，攒足回家过日子的费用。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民入城创造了机会。但是，中国农民撞城入城后，城市的权利依然只赋予本地市民，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

2010 年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90 后已经成为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 21.7 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疏离，每年平均在外时间达 9 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他们之中 87.3% 的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间仅 0.7 个月。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515 年。他们迁移的距离离家乡更远，跨省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是他们的主要选择。

他们既看重在外挣钱，也更加注重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孩子的教育成长。他们中有很大比例的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间由父母一方回县城陪读，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农二代在城市的消费方式已经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在外面挣得的收入 70% 在城市消费。

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强，农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那

堵墙隔离，他们对不被城市接纳的感受更强。农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变“故土”，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非正式规则等正面临严重冲击与挑战。

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经历一场历史转型，标志着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国”的到来。如果有一天他们还要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农二代面临的严峻现实是，他们如果不回村，进城就成为主要的选择。他们的未来，将取决于城市权利向农二代的开放。与已经走过的城市化上半场相比，下半场最显著的变化是进城农民的代际差异。若继续沿用对待农一代的公共政策来应对这一革命性变化，将给中国转型带来巨大挫折。

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农民的未来。长期以来我们在农民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让农民成为城里人的制度设计。自20世纪50年代起，户籍制度将农民与城市人划为两类，限制了农民的流动与发展。尽管后来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可以在家乡从事工业，但他们仍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未变。再到后来，即便进城，也缺乏落户政策，使他们成为城市的漂泊者。

政策设计一直基于农民会回乡、应该回乡的假设，但这样的思维只会让农民永远停留在原地。农民的现代化必须通过他们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来实现，这是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促进这种转变，那么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目前，两三亿人漂泊在外，漂不动了又回到乡村。一个国家如果大部分人口仍是农民，且无法被城市接纳，无法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转变，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文明形态、观念，创造财富的能力等，不能成为城市中平等的一员，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让农民留在乡村来实现的。

解决农民进城后的问题，关键在于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定下来。农三代，那些在城市中出生、成长的孩子，他们对城乡间的不平等已不敏感，但制度上他们仍被区别对待。我们需要从教育平权开始，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因为这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

当农二代获得居住权，农三代获得教育权，他们的家庭便能在城市中稳定下来。有了这两个“稳住”，农民是否回乡或留在城市，便成为他们的自主选择。我们应做的，是确保农三代享有教育权，农二代享有居住权，这样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才能更加体面。

农民的去向，取决于我们对待农民的基本理念，“十四五”期间是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农民现代化取决于对农民入城还是回村的政策选择，这些政策选择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面对乡村老人日益严峻的生存现状，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难以为继。我们亟需深入剖析乡村老人的生活状况，重塑其生活境遇，提升生活质量，为乡村老人点燃希望。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改变乡村养老保险“广覆盖、低水平”的现状，逐步缩小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差距。

同时，必须摒弃将老年人视为负担的陈旧观念，在乡村经济活动主体长期是老年人的现实下，积极开发乡村留守老人的人力资源。通过推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服务项目、社区服务，建立老年人协会等社会组织，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来源：乡村发现 2024 年 5 月 16 日）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破解农民增收难

魏后凯

切实统筹好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有效破解种粮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必须确保的目标底线；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国创智库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分析认为，在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体形态、种粮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

正视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之间的目标冲突

由于粮食生产成本较高，粮价上涨受限，种粮比较收益一直较低。自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后，粮食生产不仅无法给地方带来财政收入，还需要地方财政的大量投入，全国产粮大县大多是财政穷县。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牺牲。种粮比较收益较低，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较少，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地方抓粮动力不足。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前些年耕地“非粮化”倾向明显，这种倾向是土地流转租金较高、种粮效益较低、耕地用途管制不严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二是耕地撂荒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在一些山区、丘陵区和城郊区，大量耕地撂荒将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三是粮食主产区呈萎缩态势，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目前全国能够调出粮食的仅有少数几个省份。近年来，尽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但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尤其是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经营净收入较少，农民增收更多依靠兼业化而非主要靠种植业。

妥善处理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关系

要有效破解种粮农民增收难的困境，关键在于处理好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把两大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下实现统筹协调。一方面，促进农民增收必须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农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突破粮食安全底线。另一方面，对于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和新型组织，必须建立多元化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使种粮农民和新型组织收入同样能够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中央和省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纵向和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通过完善多元化的利益补偿机制，真正实现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

多措并举统筹好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

在新形势下，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需要采取多元化实施路径。加强耕地保护与合理

利用。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是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坚持高标准建设，强化后续管理维护，全面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按照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要求，优化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占补平衡制度，真正做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加强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深入实施耕地撂荒治理行动，加强闲置低效用地再开发再利用，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村村挂钩，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非传统耕地资源开发，不断拓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空间。多途径提高粮食生产率。中国粮食生产的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等，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要以提高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为突破口，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切实提高粮食生产率。要适应城镇化和乡村产业多样化需要，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进一步减少种粮农民人数，通过土地流转、托管服务、代耕代种、股份合作等方式，实现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使种粮农民走上职业化、知识化、组织化道路。要加快粮食科技创新和良种培育，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进一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粮食生产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不断提高粮食产出水平和质量。加快发展现代化粮食大产业。当前重点是加快转变粮食生产方式，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实行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三链”协调联动，构建纵向融合和一体化的粮食全产业链。

挖掘粮食生产的多维功能，尤其是经济、文化、教育、生态、景观等功能，推动粮食生产与粮食加工、电商物流、文化旅游、休闲康养、教育体验等全面深度融合，促进粮食产业的横向融合和一体化。不断优化粮食产业布局，引导和推动粮食加工环节更多布局在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让种粮农民和主产区更多分享粮食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既包括对生产者的利益补偿，也包括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和对粮食生产的生态补偿。中国现行粮食生产的利益补偿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和纵向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上，缺乏粮食产销区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国家生态补偿制度尚未把粮食生产纳入进来。可以考虑在完善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按照“谁吃粮谁拿钱、谁调粮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粮食生产除了提供各种粮食产品外，还创造了生态服务价值，应将粮食生产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范围，积极开展建立粮食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探索，根据粮食生产提供的不同品种的生态服务价值，按亩给予相应补偿。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4年4月12日)

重视研究改革开放的地缘差异

赵树凯

今天论坛主题是，“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宏大而具有深意。这是值得长期研究的大主题，应该贯穿长时期的中国发展研究。

我长期做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结合农村问题谈点看法。我想说的是，中国农村七十年变迁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研究改革开放。

一、最近四十年间，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这种奇迹来自于改革。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改革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核心成果，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恰好在 45 年前的昨天，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是中国进入改革新时期的根本标志。但是，如何改革开放，是逐步解决、不断展开的过程。随后遇到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三中全会预定方针，甚至恰恰相反。三中全会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因为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而改革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两年之后，1980 年秋天，经过激烈的争论，新中央文件允许在落后地区包产到户，但是仍然规定“不准雇工”，因为雇工经营是资本主义剥削。可以设想，如果不允许雇工经营，难谈个人创业，更难想象现在的市场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在改革研究界，很多人都知道杜润生。从 1979 年到 1989 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所有农村改革文件。晚年，他总结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他还有更通俗说法，农村改革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是依靠某种现成的思想理论就可以一往无前。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遇到挑战，不断遇到过去匪夷所思的事情，现成的思想理论不再管用，需要在思想理论上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改革历程显示，如果说社会发展有规律，那么，发现规律的过程非常艰难，充满曲折，任何人都不能轻言掌握了规律，因为人的理性有限。改革开放是不断突破的过程，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不能因为有所发展就自鸣得意，孤芳自赏。所以，党中央提出“改革永远在路上”。

二、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是一个概念，也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改革与开放是整体性的，有机结合的，改革也是开放，开放也是改革。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改革与开放又可以分开。开放，是思想的包容，胸怀的宽广，体现心态和眼界；改革，则更具有行为突破性、挑战性，更体现魄力和担当。

现在回顾改革发端，通常先说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 年上半年，中央曾连续组团赴欧美考察。从中央领导到部门、地方领导，在考察中看到了差距，开拓了视野，激活了思想，找到了差距，激发了改变。这成为决策层推动改革的思想源头。可以说，这场考察是改革的重大启蒙。现在，改革史

研究有个通常说法，开放早于改革，或者说改革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进改革。

在广东，很多老干部都知道张根生，建国后他曾经是韶关地委书记，后来多年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七十年代后期，他调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在当时的农业部领导中，他最早支持包产到户。他后来回忆，1978年第一批跟随副总理谷牧到欧洲考察，他看到欧洲的家庭农场，也是农业现代化，因此改变了思想，家庭经营与现代化并无矛盾。由此可见开放或者开阔眼界的重要性。

讨论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也许还可以把历史时段拉长一点。近代中国的五口通商，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放，但是被迫的开放；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开放，是主动开放，但排斥外部的制度文化，坚持中体西用。所以，这样的开放，并非真正的改革。清朝政府有开放、无改革，危机不断加深，注定了败亡。所不同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被动开放，但是，化被动为主动，开启了真改革，文化上、制度上脱亚入欧，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用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世界，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的永恒动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光辉灿烂，我们对此充满自信。我们也看到，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是因为坚持了改革开放，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而不是因为仅仅发扬了传统文化。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学习，固守传统文化，就很难设想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奇迹。

三、今天来到了中山大学，我就想到了农村改革中的广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个月，1978年10月中旬，通过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央领导知道一些地方发生了政策突破，一个是安徽凤阳县的包产到组，一个就是广东的甘蔗种植包产到人，增产两倍三倍。那时候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户还没有出现。“包产到人”比“包产到组”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上更进一步，这是广东农村改革的最早突破。

改革早期，发生在广东的更大的政策事件，是在1981年初，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大量雇佣工人。这突破了中央的政策规定，引发了比包产到户更持久、更深广的政策斗争，意见针锋相对。在高层领导中，一种意见认为，雇工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该制止；一种意见认为，发展经济不能照搬老的框框套套，政策应该突破。这场争论持续多年。1989年，中央文件还规定共产党员不准雇工。但是，政策无法得到执行，社会潮流势不可挡，发展成为现在的局面。

在今天看来，农业家庭承包、允许私人雇工、允许个人经商办企业、允许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都是一些寻常事。但是，当年都经历很激烈的政策斗争。这说明，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许多问题都是不断认识提升的过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一样，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突破旧东西，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

谈到广东农村改革，我首先想到一个人，就是杜瑞芝。广东的农村改革是在杜瑞芝的主持下不断开拓的。五六十年代，杜瑞芝长期担任佛山地委书记，以言论大胆著称。1961年初，毛主席到广东，曾找他谈话，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事后，毛泽东对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说：“你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什么都敢说”。1980年代，杜瑞芝是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主任，参加了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所有文件的起草过程。那些年他经常到北京开会，我在会上是工作人员。他与中央领导讨论时说：“所谓农村改革，是农民拿着扁担打政府的屁股打出来的，农民步步紧逼，政府节节败退”。他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一个道理，政策应该顺应人民要求。这和党中央的总结，虽然语言表述不同，但是精神内涵一致。党中央总结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

四、这几年，我在整理1949年以来的农村政策变迁史，特别是农村改革史。我常常感到困惑：不

同地方的政策表现、发展绩效，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相同政策和方针，相同政治运行体制，读同一个文件，传达的同样会议精神，但是，不同地方的政府，采取的政策行为不同？有的地方更善于政策突破创新，口号是“遇见黄灯抓紧走，遇见红灯绕着走”；有的地方则更加循规蹈矩，不仅不能变通突破，而且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发展绩效就大不相同。

大跃进时期，有个著名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这不仅是个口号，也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经验。这使人联想到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这个“经验”出在山东，半个世纪之前这里是义和团发祥地。文革中期，山东省委提出“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由中央转发全国，将学大寨运动推向政治极端，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认定阶级敌人的标准。由此我也想到，从全国来说，大跃进都在搞，学大寨都在搞，但是这样极端的口号，这样的经验，是否能出在广东？建国初期，广东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都相对温和，而不是那么激进暴烈。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地缘政治研究，但是，在中国范围内，是否也应该有地缘政策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地缘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我在看政策史料中发现，文革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地方，往往后来在改革发展中走在了前边，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沿地区，如浙江温州。深层的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差异，政治、政策和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归结起来是人的差异。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出在广东，而不出在山东、河南？中国的这种地域差异，甚至超过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之间，如奥地利北部和德国的南部地区，荷兰与比利时，法国东部与瑞士西部，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甚至远不如中国的南北方或者东西方更为显著。所以，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研究国家治理，研究区域发展，也要研究区域历史传统，研究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和理念。这是改革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发展处于新时代，面临的困惑挑战多，需要反思总结、深入研究的问题多。近代以来，广东是中国开放变革的高地。站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研究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会激发特殊的想象力，会有不一样的灵感，会有特殊的高度和深度。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作者在中山大学主办岭南发展论坛（2023）上的讲话稿，原题为“研究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2023年12月23日。）

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有偿使用费，何错之有

吕德文

近日，“中国三农发布”报道的“内蒙古开鲁县蹊跷的增补承包费”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由于报道中基层干部的话语太有画面感，很是能够刺激人们的神经。人们的关注点聚焦于基层干部的不当言行上，却对新闻报道的新增耕地有偿使用费的问题，缺乏理解。笔者根据有限信息以及过往的调研经验，对此问题做一个简略分析。

1、问题背景是，开鲁县是上级确定的新增耕地高效利用的试点单位。报道中所涉及“增补承包费”，实为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的有偿使用费，是试点内容之一。租户主要诉求是，过去的草地改成耕地，是个人投入的，村集体无权增收承包费。但实际上，这种话术，完全忽视了另一个关键点，草地变成耕地，涉及到土地用途管制，且不说其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很可能涉及到违规违法。仅仅是地方政府承认了这种用途改变的事实，且让其合规化了，产生了合规化成本，就是一个充分理由。并且，合规化的耕地意味着今后这些租户可能会享受国家规定的地力补贴的优惠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新增耕地的收益并非租户自己生产的，而是政府和村集体一起参与的。村集体是土地的所有权人，也是承包经营权的发包人，当然有权参与新增耕地收益的分配权，于情于理都是没问题的。该村不少农户认可并交纳费用，但几个大户却不交纳，在民间道义上，已交纳的农户肯定会觉得不公平。

2、退一步讲，从合同关系的变化看，很多年前签订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合同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利要求根据实际补充条款，重新界定权利义务关系。外人都觉得，既然涉及到法律问题，一开始就走法律程序，就避免了矛盾。但事情并不是这个道理。法律一般指解决矛盾冲突，如果能够协商，或通过做工作达成共识，的确不应该滥用法律。毕竟，无论是从租户角度看，还是从村集体角度看，友好协商是最好的结局。只不过，协商的时机、方式，本身也是讨价还价的策略。不能排除的是，地方政府正是要赶在春耕之前，把承包费收上来，否则，就不太好做下一步打算：万一协商不成，还可以把地收回来。但这种赶在春耕之时协商的方式，对那些租户的确不友好。租户本能会引入外援，包括让媒体来曝光。当然，事情已经演变到如今局势，矛盾冲突公开化了，的确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3、此事，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20年前的税费改革前后，很多农村地区的村集体收不上税费，上级转移支付又少，村级组织的运转都成问题，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村集体资产流失现象。比如，将村庄的“四荒地”以低价的形式承包给别人，其中难免有私相授受的行为。因此，农业农村部门过去一些年来，一直在清理不规范的村集体合同，重新理清承包关系。现如今，农村生产关系早已发生变化，这几个“大户”，大概率不是普通农户，更接近于资本下乡。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阻挠大户春耕并不是基层干部，而是其他普通农户。这说明，大户和普通农户之间的利益并不相同——但舆论传

播上，这些大户却成了“农民”。恰恰相反，普通农户和村集体利益是一致的。这也提醒我们，各地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得谨慎培育大户。

4、但凡是有基层经验的都知道，试点工作都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涉及到利益调整，必定是攻坚克难的事情。因此，承担试点工作的基层干部，往往都是工作能力较强、执行力比较好的干部。报道中出镜，事后被免职的镇党委副书记，大概率是该镇的工作骨干。从单独截取的报道画面看，这名基层干部的确言行不当；但在基层治理中，但凡是在攻坚克难的时候，这种话语都不算特别。他所说的他自己“不懂法”，只是一种言辞策略。言行往往要和工作环境和工作对象相结合，才能获得足够理解。基层工作本来就是处理矛盾的工作，基层干部并不完全是裁判员的角色，他们自己就是运动员，以符合地方情境的言行来获得竞争优势，包括利用情理做工作，利用强力压服不配合工作的人，利用法律来增强合法性，都属于正常。一些粗鲁言行在具体情境中实属正常，但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境，就容易制造不良社会影响。这位镇党委副书记为个人言行负责，被免职并不算冤。但他是在攻坚克难过程中，以群众听得懂的话来履职的，无论是目的还是行动，都属于公务行为，他被免职，某种意义上属于背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其履职素养的确有提升空间，他以为自己合理合法，以至于面对镜头还非常自信，完全没有预料到地方政府其实非常忌讳“不良社会影响”。

5、基层工作有复杂性，非常遗憾的是，今天少有人会去理解和正视这种复杂性。出现了干群矛盾，一杆子把矛盾打在干部身上，完全不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群众内部有分化，干部中间也有差异。一些今日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历史遗留问题。一些在大众看来不可思议的画面，但在具体场景中有其合理性。某种意义上，镜头和纪律都是一种切割器，都习惯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对基层的容错极其有限。最终的结果是，基层干部很可能会成为套中人，不说话、不显山露水，长此以往，基层矛盾就不会有人去碰，没人去解决。基层治理是一种策略，策略的实质不在于大家履行众所周知的道理，而是承认自己无法理解的“秘密”——无论是大户的抵抗行为，还是普通农户的攀比心理，以及基层干部的多样性，在我们还没办法将其规范化的时候，最好还是同情性的理解。

（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来源：新乡土，2024年4月24日）

乡村消费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动能

全世文 乔 慧

近期，一些美西方政客和机构频繁抛出“中国经济见顶论”，大肆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虽然其“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繁荣接近尾声”的论断被屡屡证伪，但恶意炒作之声仍不绝于耳。究其原因，一方面，美西方人士试图借此影响中国企业和居民预期，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和市场优势认知不足，对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内生动力不甚了了，或者是故意避重就轻、避而不谈。

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源自不断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日益完善的内需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累计达82.5%，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其中，乡村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尤为突出，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4年一季度，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16047亿元，增长5.2%，增幅比城镇高0.6个百分点。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中国乡村消费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并逐步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能，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

农村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和科技创新在农村区域下沉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乡村消费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乡村消费市场实现内通外联，城乡经济循环加速打通。2023年，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470万公里，全国累计建成1267个县级公共寄递配送中心、28.9万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和19万个村邮站，邮快合作建制村覆盖率超70%；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92亿户，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道路硬化、电网升级、宽带网络普及，极大地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让农村居民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现代生活带来的消费便利。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消费新场景，农村居民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各类商品，不仅重塑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还进一步激发了潜在消费需求。

收入持续提升催动农村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尤其是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快速提升，有效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2024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96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实际增长7.7%，增速比2023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0，比2023年同期缩小0.05。收入水平提升使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不断提振，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2024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050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实际增长9.2%，增速比2023年同期提升5个百分点，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高1.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支

出比下降至 1.77，比 2023 年同期降低 0.02。

高品质消费成为新趋势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消费模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更高品质生活转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梯次升级趋势明显，消费增长快、潜力大、追赶城市居民的特点越来越突出。2023 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2.35%，比 2022 年下降 0.63 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下降符合居民食品支出比重伴随收入增长而下降的一般趋势，表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品质改善。相较于“衣食住用”类生存型消费，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发展型消费支出增长更快。2024 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速均高于人均食品烟酒、衣着、居住支出增速。同时，农村居民追求更加便捷的出行和通信方式，以及轻松舒适的居家生活方式，耐用品消费需求不断释放。2013 年至 2022 年，汽车、家电等耐用品在农村普及程度快速提高。尤其是在 2022 年末，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和电动助力车拥有量分别为 2013 年的 3.3 倍、2.0 倍。但农村耐用消费品市场仍未饱和，具有较大追赶空间。

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的持续攀升和耐用消费品普及率的显著提高，反映出农村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在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加持下，农村居民收入有望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进一步缩小，农村居民对健康、休闲、教育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对绿色、智能、个性化产品的青睐也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也预示着乡村消费市场的广阔前景。随着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和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高品质消费将成为乡村消费市场的新趋势。

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成为新亮点

在中国政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乡村消费市场的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产业链整体质量显著提升，对本地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吸引力不断彰显。近年来，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异军突起，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激发乡村消费市场活力、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2023 年，随着旅游市场全面复苏，中国乡村旅游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农业与旅游、科普、康养等服务业高度融合发展，为乡村消费市场创造了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深入推进也为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注入了智慧动力，不断激发乡村消费市场新模式，赋能乡村消费市场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2023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量新增 256 个，总数达 1953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累计达 1597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总数达 6000 个以上，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在政策倾斜和金融支持下，以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为重要载体的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不断提质升级，乡村旅游项目不断创新。以携程平台为例，2023 年平均每天推出 1.4 个乡村旅游新产品，乡村民宿供给量达到历史新高的 33 万家。各类节庆活动的举办和农旅结合模式的推广，不仅丰富了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为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农村居民通过经营农家乐、民宿等旅游服务项目，实现了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2023 年，农村居民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 18.5%。

文化赋能与消费创新成为新动力

文化赋能正成为推动乡村消费市场发展的强劲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中，传统文化与消费创新紧密相连，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2023 年，贵州“村超”“村 BA”等村级体育赛事的火爆，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一抹亮色。这些由村民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不仅展示了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

的新追求，也反映了他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向往。乡村地区的现象级体育赛事，凸显了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正逐渐转变为生活中的主导性需求。

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与传承活动广泛开展，不仅丰富了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激发了文化产品的消费创新。2023年，随着第七批共50项传统农业系统荣获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累计认定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达188项。同时，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第六批新增1336个传统村落，中国传统村落总数达8155个，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为乡村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文化产业与乡村经济的深度融合。文化赋能与消费创新的结合，不仅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展现出文化赋能乡村消费市场的广阔前景。

风物长宜放眼量。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和生活品质；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强对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支持和引导，充分发挥文化资源在乡村消费市场中的赋能作用。广袤的乡村蕴含巨大的消费潜能，乡村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为中国扩内需、稳增长提供了重要内驱力，也将继续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正在不断积聚，必将推动中国经济顺利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口。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我们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让中国人民不断过上更好生活，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年5月8日）

土地产权国有导致 50 年环境破坏甚于过去 5000 年

陈志武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最近讲，从北京、杭州等很多城市的航拍照片看，近 50 年对物景的破坏远甚于过去 5000 年。他的结论非常引人深思。

这种史无前例的破坏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必然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近 50 年的财产与土地产权都是公有的。

这实际上把我们又带回到最近的产权改革讨论中。产权“应该尽量地国有”还是“应该尽量地私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其答案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效益以及人们自尊自信的程度，会决定社会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还会决定环境污染与破坏程度的高低。

由此可见，产权的国有还是私有，其差别远远不只体现在企业效益上。

如果能让个人或者说民间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空间达到最大，那么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的程度会被尽可能地控制到最低。

我这里先要强调，并非在土地私有和财产私有之下，污染和环境破坏就没有了，只要继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应该继续这两个方向)，环境破坏就不可避免，但破坏程度会因财产的公有还是私有而有较大的差别。

环境破坏程度与产权归属有关

这个道理实际很简单。每次回国，我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私人家里的装修都非常精致漂亮，保持得很干净；但是一进入过道这样的公共空间，往往都没有灯光、没有装饰，墙上与地上通常是脏乎乎的。——正因为这一点，去年我的一个美国学生去北京工作，本来打算买房子住，但他无法忍受那些走廊的脏乱，结果选择在东方广场租房。

从产权的眼光看，当这个空间、这个产权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会非常爱惜它；相反，越是公共的空间或财产，就越是没人去“自愿”爱惜，去管理保养。

既然人的本性如此，我们可从中得出一个更一般的结论：每个社会应该让财产、土地的私人所有程度达到最高，尽量让每块土地、每份财产都有明确的个人所有者，亦即有明确的爱惜它的人。

相反，如果让几乎所有的财产与土地都公有，那等于是让所有财产都像那些公共过道一样，任人糟蹋但却没人心痛，环境再怎么被破坏也不会是任何个人的事。从全世界的情况看，越是国有成份所占比例高的国家，对环境破坏的程度似乎就越高，当年的苏联、东欧还有拉美一些国家就是如此。

过去 50 年，中国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的装饰设计越来越乱。虽然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发挥的作用还很大，但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非常自然而且直接的办法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私人所有程度尽量达到最大。

其实，只要土地、财产都是国有，一方面个人爱惜财产的本能被闲置，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忙得再辛苦，也可能只能达到有限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俞孔坚教授的结论。在过去 5000 年里，我们的祖祖辈辈之所以能留下相对优美的环境，正是由于土地和其他财产原来由个人或宗族直接所有，所以每块土地过去总有私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惜它。

比如，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村，实行集体化之前，村庄周围本来都有山有水，森林非常茂密，一直到 60 年代初，破坏得还不是很严重。我小时候基本能看到家乡过去的本来面目，那时全村由几栋青砖青瓦几进式的大院所组成，加上周围绿油油的山山水水，确实是一个人与自然非常和谐的典型江南村庄。

但是，就如同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那样，集体化使一切归为公有，结果是那些公有的森林和土地没有人去爱惜了，任人破坏也没有人敢表示心痛。

文革初期我开始上小学，一直到高二，我们响应号召每天去“改山造林”，先把好好的自然林砍掉，然后挖上许多长、宽、高各一米的大洞，植上新树。几年后，原来的自然森林没有了，新种的树也死光，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山头。

有意思的是，1978 年土地的使用权分到各户以后，人本能的“自己的东西会最珍惜”的态度又重新发挥作用，人们又越来越注意保护森林与其他财产了。这使森林等环境又慢慢在恢复，但是房屋建筑的破坏是没有办法挽回了。

当然，土地现在还不是私有，所以人们对土地的爱惜程度还是有保留。未来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让人难以把目前有“使用权”的土地 100%看成自己的，因此短期行为还是理性的。

私有产权提供环保制约机制

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污染和破坏也曾经非常严重。因此，私有产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却可以高、可以低。

像计划经济时期，我老家没有被工业化，但其环境却遭到空前的破坏。而通过土地与财产的私有，人们会被激励不去随意践踏环境，私人产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把破坏尽量降到最低的制约机制。这是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

比如，现在在很多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肆意征收作为开发区或是建房子，这些可能是城市化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本身是好事，但是，因为土地是国有的(或集体所有)，如果投资方和开发商能疏通一些关系的话，往往可以较低的价格把土地的使用权买下来。

原因很简单，这些土地不属于签字售地的官员，他们得到的好处仅是创造了政绩，那么这些官员为什么要珍惜这些土地？他们为什么要争取最高的价格？这跟私人卖自己的地是两码事。

正因为开发商用低价就可以得到这些土地，他们买过来后，这些土地是不是以最有效益的方式被使用、其长久价值与生态影响怎样等等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根据市场规则，如果卖的一方很珍惜这块土地(因为卖的是自己的地)，卖方可能要的价钱非常高，而买的一方因为付出了很高成本，就会以更爱惜的方式使用这块土地，以产生最高的长久收益，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

这就间接约束了买卖双方，使他们都更珍惜土地。也就是说，如果是私有产权的话，人们会因为成本、环境等一系列的原因而有所顾忌。在公有化的条件下，因为没有人会珍惜，而官员又只看重短期政绩，这样，连私有产权所特有的成本约束因素都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如果每块地方、每个空间的产权都具体化到个人，那么张三在这块土地上污染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旁边其他人拥有的土地或者资源，破坏了他们产权的价值，他们就可以起诉张三。

但是，一个人对土地和资源的破坏会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而最终给自己带来官司和损失，这种间接约束在公有产权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为邻家土地也是公有的，他们也不会受太多激励去保护。况且，土地都是国家的，你连诉讼的资格都不具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州的小河一个个污染得臭气熏天，但也没有谁去起诉谁。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逻辑是说得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营企业钻政府的空子，尽量让地方政府给他们最大的环境污染空间。——可是，这恰恰证明，让太多的资源由那些与其无关的官员来控制，后果只会很糟糕。而如果土地产权归个人所有，你即使对其所有者进行贿赂，也不会轻易得手。

（作者：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来源：《新财富》杂志，2005年1月13日）

健全农民自建房长效管理机制

瞿理铜

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安居才能乐业。只有农民居住质量日益提高，生活愈加舒心，乡村才能称得上“宜居”。住房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安全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要求。受成本、习俗、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民自行建房依然是大多数农村农民建房的主要形式。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农民自建房安全生产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如何完善农民自建房管理体制机制显得日益紧迫起来。

一、当前农民自建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调研显示，当前农民自建房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自建房安全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足，导致农民对乡村建房方面的法律法规掌握不到位，农民对自建房安全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笔者在村庄调研与农民交流过程中发现，所调研的大部分农民认为当其自建房出现安全责任事故时，主要责任应由施工队或乡村建房工匠来进行承担，自身并没有任何责任，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

（二）农民自建房未批先建的现象屡禁不止

受传统意识和习惯的影响，部分农民认为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属于自己的事情，无需进行审批，部分地区农民在新建、重建、改建和扩建住房过程中未批先建的现象屡禁不止。此外，由于乡村地域范围广，加上乡镇政府农民自建房监管人员力量不足，使得农民自建房监管存在一定的“真空”。虽然近年来基层政府对农民新建和重建住房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管控，管理逐渐规范起来，但是农民改扩建住房未批先建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三）乡村建房工匠制度不健全

乡村建房工匠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自建房建造过程是否安全和建造质量是否合格。近年来，公共财政出资开展了乡村建房工匠培训，乡村建房工匠建造水平得到一定提高，但与乡村建房高质量要求相比，乡村建房工匠制度还存在一些漏洞，主要表现在：乡村建房工匠准入机制、安全责任机制、信用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等缺失。由于乡村建房工匠制度不健全，导致乡村建房工匠鱼龙混杂，部分乡村建房工匠安全意识淡薄，农民自建房施工过程不够严谨，施工质量有待提高，导致农民自建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四）农民自建房监管机制不健全

由于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有限，加上过去交通不便，农民自建房未履行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对农民自建房不知情，农民自建房监管无从谈起。虽然近年来乡村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是随着部分地

方合乡并村，使得乡村建房监管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整体上加大了农民自建房的监管难度。此外，基层工作人员收入有限，难以招聘到建筑类专业人才，乡镇政府建筑类专业技术人才较为匮乏，现有乡镇工作人员在农民自建房监管过程中也只能看到一些表面上存在的问题，无法从房屋结构和建筑材料等专业角度去监管。

二、健全农民自建房长效管理机制的相关建议

为防范农民自建房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出现安全风险，应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建立健全农民自建房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农民自建房重大安全生产风险，切实织密织牢乡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

（一）压实农民自建房安全主体责任

按照“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农民自建房的产权主体房屋安全主体责任。加大农民自建房安全主体责任的宣传，让农民意识到自身才是其自建房的第一责任人。在农民自建房审批过程中让建房农民签订自建房安全生产承诺书，对于自建房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风险承担主体责任。对农民开展自建房安全生产培训，对农民自建房中的安全风险点进行讲解，讲解过程中运用现实中的生动案例，提高培训效果，增强农民建房过程中的安全意识。

（二）加大农民自建房未批先建约束力度

遏制农民自建房未批先建方可加大对其监管的力度。具体措施方面：其一，对农民占用耕地（含基本农田）未批先建自建房，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对农民未批先建自建房不予以产权登记，并明确未获得产权证书的农民自建房未来不享受任何农民住房改造的政策待遇，如未获得产权证书的农民自建房，当该自建房成为危房时，不享受国家危房改造的政策待遇。其三，对未批先建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民自建房实施强制拆除，并在乡村地区加大对未批先建强制拆除案例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建房履行审批手续的意识。

（三）完善乡村建房工匠制度

不断完善乡村建房工匠制度是强化乡村建房工匠安全意识，提高乡村建房工匠水平的关键所在。具体措施方面：

其一，建立乡村建房工匠准入机制。将乡村建房工匠纳入国家执业资格目录，实行培训考试合格上岗制度，对于考试合格的乡村建房工匠发放执业资格证书。定期开展乡村建房工匠继续教育，根据乡村建房需求变化，不断提高乡村建房工匠安全意识和建房技术水平。

其二，建立农民建房工匠责任制。开展农民自建房工匠登记备案，引导农民与乡村建房工匠签订农民自建房安全施工协议，明确双方责任，当农民自建房出现安全生产事故时，农民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乡村建房工匠进行经济索赔。

其三，开展乡村建房工匠信用评价。成立区域乡村建房工匠信用评价专家库，定期对乡村建房工匠建造作品进行质量评价。开展乡村建房工匠建造水平信用评级，根据评级结果颁发相应证书。建立乡村建房工匠黑名单制度，完善乡村建房工匠退出机制。当农民自建房建造和改扩建过程中出现安全生产事故时，对参与建造的乡村建房工匠纳入黑名单管理，并在全域范围内进行宣传公示，注销其乡村建房工匠证书。

（四）完善农民自建房监管机制

保障农民自建房安全离不开完善的农民自建房监管机制，应多措并举不断完善农民自建房监管机制。

其一，构建村庄农民自建房协管机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村庄常住人口中聘请 1-2 名村庄农民作为农民自建房协管员，定期对协管员进行培训，提高其政策法规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明确协管员主要职责：定期巡逻村庄，发现是否有村民未批先建自建房；向村民宣传普及自建房相关政策法规；对农民自建房建造过程进行动态监测等。

其二，压实农民自建房审批部门的监管责任。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将行政审批权和安全监管责任衔接起来，压实相关审批部门在农民自建房管理过程中的监管责任。相关审批部门在农民自建房竣工后，应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竣工验收，明确不经过验收的农民自建房不得使用。

其三，探索建立农民自建房第三方监管机制。单纯依靠现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难以实现对农民自建房建造进行有效监管。建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化建房监管企业、社会组织充实农民自建房监管力量，在农民自建房竣工验收、危房鉴定、自建房改经营检测等过程中聘请专业化公司或社会组织参与，增强农民自建房监管力量。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 年第 2 期）

《农业与工业化》——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创新

张蓝水

【摘要】：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学者张培刚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成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张培刚是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培刚回国后有 30 年与经济学失之交臂。《农业与工业化》是解决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把钥匙。改革开放使之成为一份珍贵的藏宝图。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 述评 农业国工业化

农业经济学家郭书田在给大学生讲中国国情时，常介绍 4 位一生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的前辈梁漱溟、宴阳初、费孝通、张培刚。后者是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1945 年 10 月张的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学者的经济理论创新，对农业国社会转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

张培刚（1913. 07. 10-2011. 11. 23）的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是世界经济学人首次就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研究专著，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1947 年获国际经济学“威尔士奖”，194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哈佛经济丛书》英文版第 85 卷面世。费希尔总编辑盛赞为丛书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1951 年西班牙文版在墨西哥问世。直到 1984 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才推出《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

《农业与工业化》国际名望甚高，世界经济学界称之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张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1982 年世界银行专家钱纳里在上海讲学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培刚·张”。然而，自 1946 年回国后，张培刚在很长时间没能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与国外学界的长期隔绝，以致被世界经济学领域所不知，他也不知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趋热”。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刘易斯与舒尔茨荣获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54 年 5 月面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提出“二元经济”模型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20 世纪 50 年代起提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人力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国内谈经济发展的书籍和文章，离不开刘易斯、舒尔茨，却很少引述 1945 年《农业与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学思想。

发展经济学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走向富裕的经济学。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历史不容假设。若自博士始一直投入经济学教学、研究，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肯定会有张培刚！

1940 在昆明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时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说，《农业与工业化》是“二战”后为新兴的“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

30 年未事经济学的哈佛博士

1913 年张培刚生于湖北省。1929 年考入武汉大学预科，1930 年秋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34 年夏毕业，被选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积累 6 年学术实践功底。1940 年张培刚在昆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1941 年 9 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处经济学全盛时期，哈佛大师云集。选读张伯伦（Edward H·Chamberlin）《垄断竞争理论》和布莱克（John D·Black）《农业经济政策》等课程。1943 年末获硕士学位，攻读经济学博士，接受“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研究课题。1945 年 10 月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谢绝“哈大”和联合国聘请，张培刚 1946 年 8 月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兼经济系主任。1947 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4 月成为 1946-1947 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获奖的亚洲第一人。1948 年 1 月，受聘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1949 年 2 月辞去联合国的顾问和中研院的研究员职务及哈佛大学任教邀请，回到武汉大学任校委会常委兼经济系主任。

1952 年，在“左”的路线下，认为他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调他筹建华中工学院，自此约 30 年未能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1989 年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走向衰落，他发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论文，为发展经济学正名助力。1998 年，张培刚始任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博士生导师。晚年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

张培刚 1946 年、1949 年初两度回绝了哈佛大学任教邀请和 1949 年初联合国职务的挽留，回到武汉大学。1951 年前中国经济学领域璀璨的这颗星，以后 30 年失去经济学本业机遇，直到 1989 年人们在 6 月号《经济研究》杂志才重见其闪光。

《农业与工业化》的重大学术贡献

长达 20 万字《农业与工业化》，是世界第一部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其最大的闪光点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农业国的出路在工业化。张培刚披露：“论文的意义，在于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该书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论断，最早建立了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不仅是工业技术现代化，而且包括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这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和研究落后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开创性著作，国际经济学界誉之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研究农业国实现经济起飞、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张培刚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狭义范畴。《农业与工业化》主题思想与当时有人主张的“以农立国”论或“乡村建设”学派是大不相同的。本书还述及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这些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

他提出“农业的进步必然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是国家工业化应有之义。“随着工业化进展到较高阶段，农业生产的绝对数量虽然将继续增加，其经营规模亦将有所扩大，但其农业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必然将逐渐降低；同样，其农业劳动者人数，亦可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或其他方面的转移，而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减少，在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上也有所降低。”这些如今天的述说，是 75 年

前张培刚在美国调查、研究的结论。

他提出了衡量“工业化”成功的指标：“只有当工业化进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 2/3 甚至 3/4 以上，降低到 1/3 甚至 1/4 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总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也由原来的 2/3 甚至 3/4 以上，降低到 1/3 甚至 1/4 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化”。这就对国家工业化进展有了一个判定的尺度。

我国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张培刚提出：“工业发展乃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假若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农业机械化是无发生的。”农业机械化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他说：“工业化就一种意思来说，乃是一种‘资本化的’过程”“农业方面的‘资本化的’主要特征，举例来说，就表现在农场操作的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的利用上；换言之，农业资本化就是变更生产三要素的组合，提高资本相对于土地和劳动的比例。”这就是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农业工业化。

张培刚在重回经济学教学研究领域后的一个关键时刻，发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论文，批评西方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悲观情绪。他提出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围，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含在其中；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张培刚表露，在他写的 10 几本书和多篇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农业与工业化》和这篇文章。

20 世纪 80 年代，焕发二度青春的张培刚，披露了一个从放牛实践中悟出的经济理论。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他把东部沿海地区比喻成“牛鼻子”，西部是“牛尾巴”，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认为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是不行的。在沿海开放的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则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被他俗称为“牛肚子理论”。

改革开放验证张氏发展经济学

读史使人睿智。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新兴经济学的一个分支，1945 年 10 月张培刚提交《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时，尚无“发展经济学”称谓。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经济学”风生水起，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论。张氏农业国经济起飞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是 20 世纪 40 年代。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不只是传统工业现代化，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他强调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的先行地位。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迈耶关于工业化观点，才与张氏 40 年前的理论接近。张培刚从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含外汇）等方面，提出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贡献。这个观点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类似理论要早 16 年。

1946、1949 年张培刚两度回绝哈佛大学任教邀请和 1949 年初联合国职务的挽留，回国后特别是 1952 年后与经济学研究隔绝，直到 1989 年民众才在《经济研究》杂志见到“张培刚”。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与工业化》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虽说是面向世界的。但张培刚说，当时就考虑到农业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问题。通常，国人的理论更易在国内施行。可作为农业大国我们当时选择了工业大国苏联的发展模式，绕了近 30 年的大弯子，才放弃不适合国情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现今请专家讲课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可能就

会改写。

改革开放 40 多年，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如鱼得水。以对农业机械化精彩解析为例，他提出农业对机器采用程度 U ，取决于农产品价格 A 、劳动力价格 L 、机器价格 M 。三者关系 $U=A \cdot L/M$ 。若 $A \uparrow L \uparrow M \downarrow$ ，则 $U \uparrow$ 。改革使农业富裕劳动力进城打工，农户收入提高， $L \uparrow$ ，国家收购 $A \uparrow$ 。针对农忙劳动力短缺，国家施行农机购置补贴相当 $M \downarrow$ ，三项要素齐备， $U \uparrow$ 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提振农机制造业，强力助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城乡面貌大改观。此农业机械化理论堪称经典。

时代和实践需要使理论大放异彩。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国家加速工业化。社会需要发展经济学，如今《农业与工业化》成为人们手中的藏宝图。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阐发的农业国家工业化理论，对我国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中国产能过剩论”：又一张“保护主义”牌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近期，美国一些政客持续炒作所谓的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既违背了经济学基本理论，也不符合客观实际。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不过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一些政客扬言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问题“不会放弃任何可能的选项”，证明了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只是美国再次打出的贸易保护主义牌。这样的做法及其背后的霸权思维，终将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

宣扬中国产能过剩意在何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加剧，绿色能源需求和绿色产品消费需求增长强劲。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3年可再生能源》报告，2023-202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增长至7300吉瓦，其中，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占增长的95%，可再生能源或将在2025年初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发电来源。据国际能源署的另一份报告《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4》预测，到2024年全球售出的汽车中将有超过五分之一是电动汽车；2023—2035年，电动汽车库存年均增长23%。该报告还明确指出，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全球层面，由传统汽车向电动汽车的包容性过渡都取决于经济实惠的电动汽车的成功推出。

显然，在绿色需求如此强劲的背景下，中国迅猛发展的新能源产业仍无法满足全球当前以及长远的绿色需求，为何美国偏偏指责中国在这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呢？其实质在于，随着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美国担心自身在这个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失去竞争优势。

美国指责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来自政府补贴，其实是有失偏颇的表现。实际上，美国的政府补贴力度更大、排外性更强。美国已在新能源领域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做出了非常强的限制。例如，根据2022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新能源汽车购置的税收抵免高达7500美元，但却只适用于那些满足特定标准的汽车，包括电池的关键矿物必须有40%来源于美国或其自由贸易伙伴（这一比例到2027年逐年提高至80%）、电池组件必须有50%在北美制造或组装（到2029年增加至100%）等规定，实际上都在限制来自中国等国的竞争。如果补贴能成为竞争力的真正有效来源，美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早已远超中国。

新能源领域的独特中国优势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积极的技术创新、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及坚持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

从技术创新来看，2016年至2022年间，中国授权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达36.8%，年均增长9.3%，而除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地区）呈负增长。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快速增长，离不开诸多专利技术的支撑。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重点企业的全球有效专利量已超过10万件；近5年，中国固态电池全球专利申

请量年均增长 20.8%，增速位列全球第一；在太阳能电池方面，目前中国全球专利申请量为 12.64 万件，排名全球第一，充分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

从产业体系与产业链来看，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中国注重在新能源领域积极打造现代化的产业链，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例，从上游的原材料供给如碳酸锂、锂电池隔膜，到中游的锂电池，再到下游的整车制造、充电桩等都有布局，并在许多环节具有较强竞争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坚定走经济全球化之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这种一体化、开放性的产业链布局，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中国制造的新能源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

从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来看，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对绿色发展高度重视，建设大规模充电基础设施完善新能源汽车的使用环境，通过丰富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场景以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极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广泛普及，汽车销量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23 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041 万辆。《全球电动汽车展望 2024》报告指出，到 2030 年，中国的轻型车市场中将有 60% 是电动轻型车。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足够的内循环动力，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外部推力。

从坚持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来看，中国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同时，中国明确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绿色发展承诺的严肃性和执行力，也有助于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形成良好稳定的预期，加快国内新能源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保护主义不能保证自身发展

拒绝正视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的真正来源，恰恰有可能进一步制约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美国在历史上也曾对钢铁产业实施高关税等保护措施，以保护本国钢铁企业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保护主义措施虽能在短期内帮助美国部分钢铁企业利润回升，但极大程度上增加了其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导致下游行业损失的工作岗位超过了当时整个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实践证明，保护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自身产业发展得更好。

打“中国产能过剩论”的牌，不仅是无视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复苏、推进可持续发展性和增加人类福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实质上还是以牺牲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维护部分美国新能源企业的集团利益。首先，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积极的拉动效应，提升了产业效率和创新力。只要拥抱合作，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同时也是美国以及全球相关产业链（如电子电器、锂离子电池、车身及零部件，以及汽车出租、金融、技术及售后）的市场需求。渲染“中国产能过剩论”，拒绝新能源产业合作，反而会制约美国相关产业链及企业的发展。其次，排斥中国新能源产品进入美国等国际市场，就相当于拒绝了更加多样化、物美价廉的绿色产品选择。这无益于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目标的实现，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的极大威胁，也牺牲了美国广大消费者的社会福利。

习近平主席指出，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经济强国，有着自己的竞争优势，理应与中国一道作出表率，为各国发展创造机会，通过促进世界各国的良性竞争

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发展。一味搞保护主义，搞零和博弈，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当年正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拥抱来自全球的竞争，才促进了本土企业和产业的快速成长。如今，有关国家也应积极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来自中国的竞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则，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执笔人：梁泳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5月23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